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优秀青年学术著作丛书

# 道术将为天下裂

DAOSHU JIANG WEI TIANXIA LIE

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

张循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优秀青年学术著作丛书

# 道术将为天下裂

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

张循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 / 张循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495-9913-4

I. ①道… II. ①张… III. ①经学—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Z126.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010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9.5 字数：243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一、引 言 .....	2
二、不读汉宋书,也争汉宋学:清代汉宋之争“风气”的形成 .....	20
(一)科举之业与汉宋之争 .....	22
(二)读书人与学人的两个世界 .....	38
三、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双重含义 .....	67
(一)汉学与理学的对立:“汉宋之争”的第一重含义 .....	71
(二)汉学的内在紧张:“汉宋之争”的第二重含义 .....	84
四、汉宋之争与清代宋学家的汉学化 .....	115
(一)“植之本属汉学” .....	118
(二)从“汉宋之争”到“今古之争” .....	128
(三)宋学家汉学化的原因 .....	134
(四)对一个既有解释的回应 .....	144
五、化解紧张的努力与无奈:陈澧及其汉宋调和论 .....	167
(一)陈澧汉宋调和的性质 .....	170
(二)“两分之”与“两通之”:陈澧汉宋调和的两种方案 .....	176
(三)“所学不可以语人”:陈澧的处境 .....	189
六、结 语 .....	207
附 录 义理与考据之间:蒙文通先生的经学历程 .....	226
参考文献 .....	275
后 记 .....	298

## 一、引言

“汉学”与“宋学”的争论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四库提要》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sup>[1]</sup>秦汉以降儒学（或经学）演变如何分期历来众说纷纭，未必确如《四库提要》所论，<sup>[2]</sup>但《四库提要》的态度却正好显示了“汉学”与“宋学”在清人眼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程、朱宋学是清代官方的统治学说，在那个时代里居然能有另一种声音向宋学发起严重而持久的挑战，假如没有官方的默许，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默许乃至鼓励自清初以来的汉学进一步发展，正是乾隆中期以后清朝官方的态度。<sup>[3]</sup>这种鼓励政策在乾隆后期《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十六年（1781）]的前后完全公开化了。<sup>[4]</sup>戴震（1724—1777）、邵晋涵（1743—1796）、周永年（1730—1791）等汉学家应特召入馆编书，象征了官方对汉学之士的礼重，在士人圈子里激起了巨大反响。<sup>[5]</sup>所以，《四库全书》编纂活动本身不啻是为汉学之士在思想上念了一道“松箍咒”。让我们来看乾隆帝在两道有关《四库全书》的上谕中所言：

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匱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镌刻流传，仅十之一，而钞录储藏者，外间仍无由窥睹，岂朕右文本意乎！

《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富有美备，不特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储《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该处为人文渊藪，嗜奇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有珍秘，以阻争先快睹之忧，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该督抚等谆飭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钞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sup>[6]</sup>

从上谕可见，乾隆帝同意编纂《四库全书》的意图之一，就是要让《四库全书》所收大量书籍流播出去，使“嗜奇好学之士”皆得阅读。所以，他不仅是在大政方针上做出崇汉的姿态、发出崇汉的信息，而且还在实际行动上为汉学的发展提供方便。

从实际情形看，《四库全书》的颁发也的确收到了使好学之士“藉广见闻”之效。安徽汉学家胡承珙（1776—1832）在《答陈硕甫（奂）明经书》中说：

我朝说《诗》家，所见十余种，善读《毛诗》者，惟陈氏长发（启源）与懋堂（段玉裁）先生二人而已。《四库》所著录者，尚有《诗稗疏》《诗疑辨正》《读诗质疑》数种，未见其书。足下曾有此本否？近日安研武林文澜阁上，倘可借观乎？<sup>[7]</sup>

陈奂（1786—1863）浸渍于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中，胡氏希望通过他代为借阅所需之书。这是《四库全书》可以让汉学家“藉广见闻”的一个显例。而胡承珙得以知道陈启源为“善读《毛诗》者”，也是拜《四库全书》

之赐。他曾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向未见刻本，顷在京师，朱兰坡（珩）借《四库》书副本钞藏，因得借读一过。”<sup>[8]</sup>则胡承珙之受惠于《四库全书》，不可谓不大矣。像这样受惠于《四库全书》的人当然远不止胡承珙一个，<sup>[9]</sup>所以《四库全书》的颁行必然会成为汉学之风在士林兴起的一大助力。翁方纲（1733—1818）曾观察到：“今日上则有钦定诸经传疏义说，下则内外皆有《四库》书写本，即以科举时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患其俭陋者，今已转欲防其鹜广嗜异之渐。”<sup>[10]</sup>《四库全书》之有助于汉学的兴起，翁氏之言已经道出此消息。<sup>[11]</sup>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颁行这一事件就像是一座桥，把官方统治学说的调整和士林学风的变化连接起来了。乾嘉以后学术界内部“汉宋之争”的爆发自然是直接由学风的变化而引起，但再往背后一层看，学风的急速变化又与官方的鼓动紧密相关。因此，从一开始，所谓“汉宋之争”就同时具有政治的和思想的两个面向：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事实上，从根本上说，在中国传统社会解体之前，所有读书人在体制上都是国家整个政治链条中的一环，根本就不存在今日语境中所谓的纯粹的“学术界”和“学人”。这决定了“汉宋之争”这个历史过程，必然是一个政治与思想相互交融的过程。

从清末民初开启对清学史的研究以来，对“汉宋之争”的研究就分别在政治与思想这两种视角下展开了。<sup>[12]</sup>章太炎是有意识地整理清学史的第一人。他既是清学的研究者，也是清学的参与者。这一特殊的角色使他在清学史研究中既获其益，也受其弊。就汉、宋学问题而言，他曾在谈及戴震时指出：

至（戴震）言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此则目击雍正、乾隆时事，有为言之。……而身亦不敢质言，故托诸《孟子字义疏证》以文之。……东原既歿，其弟子不愆师意，奋然以为陵驾宋明诸儒，岂徒名实

不应，夫亦岂东原之志乎！<sup>[13]</sup>

曾经身在清代学术语境之中，使章氏敏锐地看到了戴震“以理杀人”之言在政治上的意义，指出他的这番“汉宋之争”绝不是单纯地想在思想上“陵驾宋明诸儒”。后人言及戴震皆能知此意，实即受启于章氏。<sup>[14]</sup>在《检讨·清儒》中，章太炎将由方东树（1772—1851）《汉学商兑》带来的一场清学史上最著名的“汉宋之争”理解为汉学家与桐城派文士之间的矛盾；又谈到以调和汉宋著称的陈澧（1810—1882），以为他“鸠合汉宋……犹揄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判色理同者”<sup>[15]</sup>。章氏有此见解，同他身为乾嘉汉学经师的嫡系传人有关，故乾嘉经师与桐城派文人的矛盾以及对不懂家法的汉宋调和论者的不屑，也都掺和在其中。这固然是其特识，但也不免减损了其“史学”上的价值。

刘师培和邓实论及汉宋之争时都发挥了章太炎的观点。刘氏作有《汉宋学术异同论》（1905年）一文专论汉代儒学与宋代儒学之异同，对清代汉宋问题则涉笔不多。其中有一言谓：“东原诸儒于汉学之符于宋学者绝不引援，惟据其异于宋学者以标汉儒之帜；于宋学之本于汉学者亦屏斥不言，惟据其异于汉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则近儒门户之见也。”<sup>[16]</sup>按东原诸儒何故对这些情况明知而不言？这背后正隐藏着思想史需要追究的问题，“门户”二字只是对此现象的一种描述，并不是严格的历史解释。

邓实也引申章太炎的观点说：“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苞）、姚（姬传）之徒，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亦诋汉。”又说：“于乾嘉之世，与惠、戴二派同时，而别树一帜者，曰桐城。桐城尊宋学，惠、戴尊汉学。……二者交相非，而汉宋遂繇之分途，文士与经儒始交恶。”<sup>[17]</sup>但是，这样以桐城“文士与经儒”的冲突来解释汉宋之争会遇到一个难题：在桐城文士之外尚有众多恪守程朱的理学之士，为

什么这些比“桐城文士”更纯粹的“宋学”者就不同“汉学”者交恶呢？若谓桐城“文士与经儒”交恶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怨的话（比如姚鼐拜师戴震而见拒<sup>[18]</sup>），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一“汉宋之争”就只不过是不同门派的意气之争而并非真正的学术思想上的冲突了。如果我们尚承认“汉宋之争”是一个与学术思想本身相关的学理上的问题，那么仅以桐城“文士与经儒”交恶来解释显然是欠周全的。章、刘、邓等人在清末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宋问题的不少线索，但他们对诸多问题尚未暇深究。

梁启超在年辈上与章太炎相当，但他专论清学的两本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与立言之际身在清朝、因民族主义情绪而看重政治的章太炎不同，梁氏的眼光主要放在思想学术一边。他在总体上将清学看作对宋明理学的大反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清代学术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sup>[19]</sup>，“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sup>[20]</sup>。在这个意义上，整部清学史不妨可以理解为一部“汉（清学）宋（理学）之争”的历史了。<sup>[21]</sup>与此同时，年轻的胡适接受了梁氏的看法，也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写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和《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等文，为“理学反动说”推波助澜。这种解释激起了钱穆的不满。钱氏于1937年出版了长达75万言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1942年发表的《清儒学案序》，对了解他在清代汉宋学问题上的独特看法尤能收提纲挈领之效。他在此文中表示：

儒家思想渊源于上古，成熟于先秦。在两汉以迄隋唐则曰经学，在宋明以迄清季则曰理学。……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sup>[22]</sup>

这样说来，则清代的“汉宋之争”就是理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了。<sup>[23]</sup>以此与梁、胡二人视乾嘉考据学为清学主流的看法相较，完全是南辕北辙。

钱氏的这种观点恐怕很难让人完全赞同，他的弟子余英时对之也有所保留。余氏在清代汉宋学上的观点有一个变化。在1970年发表的《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他说：“汉宋（自注：即所谓考据与义理）的对峙，自18世纪中叶以来即已显然。推原其始，实由于清代考据学者立意自别于宋明儒，以争取在整个儒学史上的正统地位。换句话说，汉、宋之辨主要是清儒宗派意识的产物，是否与宋明以来儒学发展的史实相应，颇成问题。”<sup>[24]</sup>照此理解，则汉宋之争不过是一种意气之争，未必是一个思想史的真问题。但在五年后写成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清初儒学处于从“尊德性”转入“道问学”的过渡阶段……下逮乾嘉之世，此一重大转变已在暗中完成，而思想史上的问题也随之而异。以前程朱与陆王之争至此已失去其中心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汉学与宋学之争。但汉宋之争只是表象，实质上则是考证与义理之争；而考证与义理之争仍未能尽其底蕴，其究极之义则当于儒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个传统的互相争持中求之。……把汉宋之争还原到“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明理学转化为清代考证学的内在线索。<sup>[25]</sup>

余氏认为汉宋之争实质上反映了“宋明理学转化为清代考证学的内在线索”，那么这个争论即是来自处于转化过程中的这两种不同的儒学传统的冲突。同时可以看出，余氏既然将宋明与清代儒学分为“尊德性”与“道

问学”两个底蕴截然不同的阶段,那么虽然他一再强调梁、胡的“理学反动说”不妥,而钱穆以理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的说法更合理,但就对清代汉宋关系的认识这一点而言,他毋宁是异于钱氏而同于梁、胡的。

在思想学术理路下“汉宋之争”的研究步步推进之际,章太炎所提示的政治理路并未被忘却。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是对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中国思想学术的宏观考察。就整体而言,侯氏采用的是“经济—社会—思想”的思路,即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反映到思想界。不过,在清代汉宋关系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他的着眼点在于政治。其最紧要的观点在下面这段话中:

康熙以来……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以及选用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的编纂,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烦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sup>[26]</sup>

侯氏明确点出了汉、宋二学其实都是官方并行提倡的政策方针,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换言之,汉学之风是

官方有意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学其实也属在朝，与宋学并行不悖。侯氏所说的正是前引乾隆上谕里的意图。但无论如何，在学术的面向上，汉、宋二学的确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汉、宋并行势必在思想界引发争论乃至混乱，清廷为何要这样做呢？侯氏给出的解释是清廷“拿文化‘开明’的欺骗，冲淡了民族压迫的仇恨”<sup>[27]</sup>。文化“开明”的形象或许确可冲淡民族矛盾，然而为造成此形象竟不惜牺牲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清廷真愿出如此下策吗？侯氏的解释终不免不够完满。

继侯氏之后，朱维铮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乾隆上谕里的秘密。在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纪》中，他指出，发生汉宋之争的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即在于从康熙到乾隆越演越烈的‘以汉制汉’的政策。他们极力提倡朱熹系统的理学，但……他们的心术并不正当：自己也不真信的学说，却强制人们去信仰。这样的复古，除了使‘朱子学’变得更叫人嫌恶，从而引出反效应，能有别的结果么？”<sup>[28]</sup>但他又注意到，清代统治者在强制人们信仰理学的同时，却又对异端的汉学加以褒奖。因而他在1988年的《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中对“以汉制汉”政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满洲贵族）提倡理学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术，一种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滥用，因此他们对于经学的异端，非但难得用权力给以制裁，反而经常以纵容或者鼓励来显示自己对于奴隶们一视同仁的宽厚。

清沿明制，把理学尊为承祧道统的学说……可是清朝又放任作为理学对立物的汉学发展，乾隆和他的子孙甚至承认汉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学问。这就使清朝的统治学说史，呈现出术与学双水分流的图景。思想领域的分裂，对于满族统治者控制汉族士大夫固然很有

利,但对于构筑遏制种种反现状思潮的堤防,则显然很不利。<sup>[29]</sup>

“种种反现状思潮”的出现另是一回事,要之,作者在此已经点出,“思想领域的分裂”并不是清廷为了树立“开明”形象而不得已承受的后果,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清廷处心积虑欲达到的目的,而“开明”形象的树立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但至此犹未能尽“以汉制汉”政策的底蕴,我们还会问:为什么清廷一定要通过“思想领域的分裂”来“以汉制汉”呢?为此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是满洲贵族“由分裂的文化心态引导出的分裂的文化政策”,而分裂的文化心态的根源,又在于满洲“君主贵族们唯恐丧失征服民族特权而产生的不安全感”<sup>[30]</sup>。到此为止,汉宋之争、清廷的文化政策、满洲贵族的恐惧心态,方环环相扣而连成一体。<sup>[31]</sup>

20世纪90年代,张寿安在思想学术的理路下率先对“汉宋之争”提出了新解释。她认为汉宋之争的实质意义是清代汉学发展出来的新义理与宋明理学的旧义理之间的冲突。她提出:“乾隆末到道光初的泛嘉庆时代是清儒新义理的建立时代。方东树书所谓‘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相咀嚼’以与程朱理学相抗,指的就是这股力量。……汉宋门户由来已久,为何至此时才显明其对峙之局并有短兵相接之势?答案很明显是:有了焦点。”<sup>[32]</sup>从中她又拈出“礼”与“理”两个概念,认为“礼理争议是……清代汉宋学之争的思想核心”<sup>[33]</sup>,“崇礼思想在嘉道间蔚成风气,并和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程朱理学的遵从者,形成对峙之局”<sup>[34]</sup>。她关注的“以礼代理”现象虽早有前人提出,<sup>[35]</sup>但在她的笔下才终于有一个系统的展现。她以礼理争议为“清代汉宋学之争的思想核心”,其实尚多有可商,<sup>[36]</sup>不过,对汉宋学的研究来说,此论的重要性更多的也并不在于她拈出的礼、理这两个概念,而在于她明确提出的“清儒新义理”。<sup>[37]</sup>张丽珠、周积明等研究者便接受了“清儒新义理”的概念,继续以之来解释“汉宋之争”,明确提出“清代义理学中持汉儒义理与持宋儒义理者之义理对

峙”方是汉宋之争“更确切的指向内容”。他们从中归纳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议题,远远不限于礼、理二字,比如情欲之辨、义利之辨、理与气、理与欲、义利与王霸等。<sup>[38]</sup>大致可以说,“清儒新义理”论是既有研究中对“汉宋之争”的一种最新的且有相当影响力的解释。

综上所述,现代学人对“汉宋之争”从政治或思想角度分别进行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意识地将此二角度结合起来考察的专篇。本书的写作即有做此一番尝试的愿望。作为后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对清代汉宋问题进行划分以求得研究的方便,但对于当时的儒者们来说,他们面对的汉宋问题其实是一个整体。他们不可能今天单纯地生活在政治的视角中,明天又专用思想学术的眼光来看问题;更不可能为后世的研究者着想,而将自己对汉宋问题的观感整整齐齐地分成政治与思想的两部分。因而,他们对汉宋问题的论说,本来就并非纯粹政治性或纯粹思想性的。通常的情况是两个面向交织在一起,需要我们谨慎地清理。举例言之。张惠言(1761—1802)在其《周易虞氏义序》里说:

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宋道士陈抟,以意造为《龙图》,其徒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sup>[39]</sup>

据“以至于今,牢不可破”八字看来,似乎当时之说《易》,仍然是宋学的天下。但他在《丁小正郑氏易注后定序》里又说:

方今士以不习郑学为耻,其考郑书者,无虑数十家,而以丁君此书为最善。<sup>[40]</sup>

照此说来,当时士人之言《易》显然又是群趋郑玄的汉学了。这与前面谓“宋之说《易》者”之言至今“牢不可破”的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就和两处的立言背景不同有关:“以不习郑学为耻”,这多半指的是由少数专业学人构成的学术界的情形;而“牢不可破”云云,则是就整个读书阶层而言,因为士人为通过科举进身入仕,就不能不埋首于宋学。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看到汉宋问题有两个互相交织的面向,那么张惠言的话就会变得无从理解了。

不过,本书在采取政治的视角时,更希望眼光向下看,而有别于前贤较多注意高层的统治者。这样一来也许“政治”的色彩将变得并不太强烈,因而我更愿意称之为“思想以外”的视角。之所以必须照顾到“思想以外”的问题,完全是因为史料内在脉络的逼使。何佑森在其《清代汉宋之争平议》中表示:“最令人不解的,有人不读宋五子书而批评宋学,有人不读《学海堂经解》而批评汉学。”<sup>[41]</sup>这个现象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大量不懂“宋学”或“汉学”的人也参与汉宋的争论。这些争论者既然并没有什么“思想”,我们就不得不到“思想”以外去考察他们的“汉宋之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弥漫一世的汉宋争论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类人的广泛参与才得以形成。风气既成,又反过来影响生活在这个风气之中对汉宋问题进行严肃思考与讨论的少数专门学人。<sup>[42]</sup>

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不能局限于少数的精英分子,因而从广义上讲,“思想以外”的“汉宋之争”其实也属于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只不过它反映的是一种“一般”状况,看到的是从当时普通(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儒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儒学的普遍状态。而少数专业学人的“汉宋之争”则涉及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反映着儒学的最新、最前沿的发展。本书的题旨更多的是关于专业学人的“汉宋之争”,目的即是想据之了解清代儒学最新的发展与特性。“反理学”是梁启超、胡适借以概括清代儒学特性的一大范式,影响力至今犹巨。余英时在20世纪70年代对此曾提出异议:“如果说整

个清代三百年的思想都从反抗理学而来，恐怕也不容易讲得通。我们很难想象，只是反，便可以反出整个清代一套的学术思想来。”<sup>[43]</sup>换言之，清代儒学应该自有它正面建设的意义。此后的清学研究者多接受了余氏的意见，希望找出清代儒学自身的特性，而不仅仅将它视为一场针对理学的反击战。

“汉宋之争”是清代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与“反理学”一说最直接相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汉宋之争”的研究者，如张寿安、张丽珠、周积明诸位，都无不想为清代儒学勾勒出正面的意义。从此意出发，他们拈出清代儒学的礼、情欲、实践等概念，以与宋明理学的理、天理、思辨等概念相对立，认为正是由于清代儒学具有了这些独特的新义理，同宋明理学的旧义理相互冲突，“汉宋之争”才由此产生。但有趣的是，细察这种解释，可以发现它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他们一方面希望努力发掘清学有意识酝酿出的正面性格，而不将之仅视作对理学盲目的反动，但他们在此基础之上对“汉宋之争”的诠释却又告诉我们，清代儒学的最大特性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反理学”。换言之，若没有“理学”这个反面作对比，则清学的性格仍旧无从认识。“汉宋之争”是清代思想史上特有的问题，因此由它可以窥见清代儒学的特性。如果说清代儒学自有其独特的正面意义，而不必完全通过“反理学”来体现其存在，那么映显着清学特性的“汉宋之争”也应当具有与清学本身相关的独特含义，而不必完全同“（反）理学”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找出“汉宋之争”（及其所反映的清代儒学）的这一独特意义，便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标。

## 注释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1上。

[2] 参看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编第六章《经学史的分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37—47。

[3] 参看[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0—13。按乾隆皇帝对待汉、宋学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言之，可以《四库全书》的开始编纂为一分界，此前他仍力崇宋学，此后则开始鼓励汉学并不时贬抑宋学，参看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见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56—192。而在王达敏的研究中，乾隆帝开始偏向汉学的时间似乎更早，参看氏著《从尊宋到崇汉——论姚鼐建立桐城派时清廷学术宗尚的潜移》，《中国文化》第19—20期，2002年，页279—293。

[4] 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专门研究，可参看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5] 记录这方面情况的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十八《周书昌(永年)别传》，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181中；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晋涵)家传》，北京：中华书局《洪亮吉集》本，2001年，页192。

[6] 两段分别为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及五十五年六月上谕，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页3中，页7下—8上。

[7]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下凡使用《续修四库全书》均为此版，恕不再注)，第1500册，页255下。

[8] 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五《毛诗稽古编后跋》，页288下。

[9] 俞樾在其《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三《钱氏纲目考订序》中说，该书“《四